

魏徵文學思想論析

The Study of Weizheng's Literary Thought

楊宗錫

Yang Zong-Xi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人文科學組講師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Air Forc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摘要

李唐建國後，在文藝方面遵循隋代便展開的南北、胡漢融合的開放自由精神，並博采各地域文化之長，兼容并蓄，從而形成雄厚健朗、自由壯闊的盛唐文化。在此過程中，魏徵整合地域文化，在其所修史書中對前代文學的歷史及發展作了概括性的評論，從中顯示出其文學主張。本文將從魏徵對文學作用的主張、對六朝文學的評論、對南北文風的看法等三個方面，論析其文學思想。

關鍵詞：魏徵，隋書，文學傳序，經籍志

Abstract

Lee Tang Jianguo, in literary terms would expand north and south following the Sui Dynasty, Hu and Han fusion of open and free spirit, and draw upon each regional culture of long, inclusive, thereby forming a solid healthiness, freedom magnificent Tang culture. In this process, Wei Zheng integrate local culture, in their repair history books made a general comment on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f literature, which shows its literature claims. This article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role of advocate Wei Zheng of literature, literature reviews of Six, on the north-south style view, etc., on the analysis of his literary thought.

Key Words: Wei Zheng, *History of the Sui Dynasty*, *Preamble of Writer's biography*, *Jingji Records*

壹、前言

西元 589 年，開皇九年，隋文帝滅陳，統一全國，結束了南北朝時代。隋朝不僅在政治上統一天下，於文化方面也開始了南方與北方、漢人與胡人的融合。然而隋朝前後不過三十八年（西元 581-618 年），歷史的航道便由唐朝掌舵，所有政治的或文化的繁榮璀璨，只得交給與漢代合稱為「漢唐盛世」的李唐王朝完成。

李唐開國，政治上頗有開新氣象；在文藝方面，則遵循著隋代便展開的南北、胡漢融合的開放自由精神；思想上則儒釋道紛呈，於不同的哲學、宗教派別之精髓多所吸收，並博采各地域文化之長，兼容并蓄，從而形成雄厚健朗、自由壯闊的盛唐文化。在此一過程中，魏徵整合地域文化，在其所修史書中對前代文學的歷史及發展作了概括性的評論；這些評論中蘊涵的文學主張，引領初唐的文藝精神，為唐代文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提到魏徵，向來以其諍臣的角色為人所認識，特別是透過〈諫太宗十思疏〉的選文教學，使魏徵剛正不阿的忠貞形象深植人心，然而其成就貢獻不僅於此。史載¹，魏徵（西元 580-64 年）字玄成，鉅鹿人（另有晉州、館陶二說），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曾出家為道士。好讀書，涉獵極廣，見天下漸亂，尤其留意縱橫之說。於隋代末年加入李密起義軍，掌管文書，後隨李密降唐，受李建成任用為太子洗馬。曾勸李建成及早除去李世民，其後太宗李世民即位，因器重魏徵，不念舊怨，數度召魏徵入內，詢問治國施政得失。魏徵懷有經國之才，性情耿直，無所畏懼屈撓，與太宗談話的內容，太宗無不欣然採納。魏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為報知遇之恩，竭盡才學心力，知無不言。作為唐初名相，魏徵輔佐唐太宗治國安民，成就了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然而除了政治家之外，魏徵還具有文學家、史學家

的身份，對初唐文化事業多有建樹，主編《隋書》、《梁書》、《陳書》、《齊書》、《群書治要》，另有文集二十卷，惜已亡佚。

魏徵的文學思想，主要發揮於其所編修史書的幾篇序文之中，同時亦體現於個人創作、以及主編書籍如《群書治要》的選文精神之內；其文學思想集中在對文學作用的主張、對六朝文學的評論、對南北文風的看法等三項主軸上，以下分別論之。

貳、對文學作用的主張

在《隋書·文學傳序》中，魏徵提出對文學作用的想法，有言：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雍闕之士，道輒輒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²

這段文章一開始，便引《周易》中〈彖傳〉對貴卦的解釋，來比附文學的作用。貴卦卦象為上艮下離，山下有火；此卦象徵文飾，卦辭：「貴，亨。」³意謂事物加以必要的文飾，可致亨通。〈彖傳〉因此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

¹ 魏徵於《舊唐書》卷七十一〈列傳第二十一〉、《新唐書》卷九十七〈列傳第二十二〉有傳。

² 《隋書》卷七十六〈列傳第四十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64 冊），頁 1068。

³ 魏·王弼《周易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7 冊），頁 222。

天下。」⁴意即觀察天的文采，可以知曉四季轉變的規律；觀察人類的文采，可以推行教化促成天下昌明。⁵魏徵引用《周易》的天文說、人文說，便將文學的作用提升到人文哲學的高度，以最寬泛的「人文」觀念，概括了先秦時代的廣義的學術觀念，以及六朝時注重情采和藻飾的狹義的純文學觀念。之後所引「言而不文，行之不遠」的話，以及所說「文明之稱」、「煥乎之美」，都表示了對文學的推崇。郭紹虞評論這段話，認為：

窮其源而以聖賢之述作為依歸，究其用而以裨贊王道綱紀人倫為標準，此雖不是古文家的論調，而古文家的論調實本於此。實則史家有此議論，沿流溯源，尚不為謬；文家有此主張，古典是式，便成為復古了。⁶

綜合《隋書·文學傳序》的話以及郭紹虞的評論，可以看出魏徵以史學的眼光評論文學的作用，非常強調政治教化的效用，但同時也注意到文學的緣情述懷功能。以下就這兩點做進一步論述。

一、政治教化作用

前引《隋書·文學傳序》中「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這是魏徵首先強調的文學作用，雖然有「大」與「次」的說法，但說的都是文學的政教作用。其中「經緯天地」，《左傳》有言：「經緯天地曰文。」⁷意謂治理國家，或規劃經營宏遠的事業。魏徵引用此言，明顯是極其重視文學的政教作用，與曹植〈典論論文〉所謂「文章經國之

大業」同意。文學的功用可以顯現在記錄各時空中發生的事件，或者將古人訓誡、典範紀載成歷史，傳予後世；或者收集民間傳唱反映民情的歌謠、稱揚嘲諷在上位者功過的文章，如同禮樂制度，能夠勸導改正人民，不作違背道德的事，亦得以匡正君主，親賢臣、遠小人。前者如《尚書》、《春秋》，後者如《詩經》，都是透過文章詩歌以達到政治教化的作用。魏徵因為深刻認識到文學的政教作用，也將此一思想發揮在主編的《群書治要》，其中選錄的《詩經》作品，諸如：

〈邵南·甘棠〉：「美邵伯也。邵伯之教，明于南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註曰：「邵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敬其樹也。」⁸

〈鄘風·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胡為。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⁹

〈衛風·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¹⁰

其它還有許多所選的詩都是像這樣的諷喻內容，便可見其注重政教作用之一斑。再如魏徵自己的名篇〈諫太宗十思疏〉亦是最好的例證，諸如文中勸告太宗：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

⁴ 同上註。

⁵ 黃壽祺、張善文譯注《周易譯注·上》〈卷三·賁卦第二十二〉，頁 132。

⁶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頁 185。

⁷ 晉·杜氏注、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十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44 冊），頁 502。

⁸ 魏徵等撰《群書治要》卷三〈詩〉，頁 36。

⁹ 同註 8，頁 37。

¹⁰ 同註 8，頁 38。

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¹¹

其內容勸誡太宗以真誠的心對待人民，使民心向善。強調身為一國之君應「積其德義」，才能攬絡民心。時時居安思危，抱持著知足、謙虛、寬宏的態度，做事小心謹慎，適可而止，以及必須賞罰分明，這些話都是在實踐魏徵自身「作訓垂範」、「匡主和民」的文學主張。

此外，對於街談巷語的小說，魏徵也從政教作用上肯定其對社會生活的反映，有言：

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于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說，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職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¹²

從中，魏徵認為小說雖然道聽塗說，有某種程度上的虛構，但小說反映了民間社會的情況，具有讓在上位者聞過失而能改之的機會，因此引經據典，不但肯定了小說的作用與價值，也提高了小

說的地位。

二、緣情述懷作用

再從《隋書·文學傳序》中「離讒放逐之臣，塗窮雍關之士，道輒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可以看出魏徵認為文學不但有「敷德教於下」的政教作用，同時也具有「達情志於上」的功能，這種對文學作用的認知，是比較周延而客觀的，既受儒家傳統言志理念的影響，亦秉承魏晉以來的緣情理論，同時對發憤著書以表情達意的傳統精神給予了高度肯定。可以說初唐以前對文學作用看法的兩大主流，都匯注到魏徵的文學主張之中。歷代的優秀的緣情作品自不必多舉，就以魏徵的詩來說，其〈述懷〉一詩，亦是「達情志於上」的代表之作：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
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
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
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藩。
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
古木吟寒鳥，空山啼夜猿。
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
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
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¹³

魏徵這首詩格調高古，氣象渾厚，在廣闊的空間感中感到了個性的實在，表達了投筆從戎、懷恩報國、不問功名的慷慨志氣，體現了魏徵在《隋書·經籍志》序中所言「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的看法。¹⁴明朝陸時雍編《唐詩鏡》

¹¹ 《舊唐書》卷七十一〈列傳第二十一魏徵〉（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69冊），頁669。

¹² 同註2，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經籍三〉，頁632-633。

¹³ 明·陸時雍編《唐詩鏡》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11冊），頁306。

¹⁴ 同註2，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經籍一〉，頁590。

收錄此篇作品，評其為：「挺挺有烈士風，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是初唐一等格力。」¹⁵

參、對六朝文學的評論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發展，如同政權的輪遞一般，變化得令人目不暇接。以時代而言，從建安時代開始，正始、西晉太康、永嘉、東晉、劉宋元嘉、齊梁永明，輪番上場，詩的內容與風格，從剛健風骨，到詠懷、遊仙、詠史、田園、山水、宮體，以及注重聲律、對仗的形式主義抬頭，似煙花次第燦爛百變紛繁，而初唐的文學正是處於這些文學流變的下游，對前代的文學不得不有所審視，從中找到繼承與創新的方向。魏徵正是處於這樣的高度，對六朝文學提出評論。

對於唐朝以前的文學流變，在《隋書·文學傳序》中，魏徵先是說「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之後便說：

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縟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¹⁶

於《隋書·經籍志》集部總論中也說：

爰逮晉氏，見稱潘陸，並黼藻相輝，宮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雲天。永嘉已後，玄風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其弊。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輝煥斌蔚，辭

義可觀。¹⁷

綜合這兩段話的內容來看，魏徵是十分欣賞詩歌的藝術美感，對於六朝的許多重要文人都給予讚賞肯定，對其藝術技巧上的成就，包括文藻辭采、聲律格調等形式上的特徵，也都秉持認同的態度。

然而，魏徵對於六朝文學的方方面面，並非一味的肯定並完全接受，《隋書·經籍志》總集序裏，魏徵提出了「世有澆淳，時移治亂，文體遷變，邪正或殊」的說法¹⁸，將文風和政治的清亂、國家的興盛聯繫起來。因此，魏徵對於齊梁格調低下、情多哀思的浮靡文風與詩歌內容，一反對詩歌藝術特徵的肯定，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有言：

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闕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¹⁹

於文中可以看出，魏徵將梁大同以來「漸乖典則，爭馳新巧」這種只注重追求形式技巧，內容格調卻是低俗的宮體駢儷之類的作品，視為亡國之音，其批評是嚴厲之極的。而之所以如此嚴厲，是因為魏徵認為君王喜好淫麗之文，與朝政得失是有關係的，曾說：

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製，止乎衽席之間。彫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為宮體。流宕不已，訖于喪亡。陳氏因之，未

¹⁵ 同註2，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經籍三〉，頁633。

¹⁶ 同註2，卷七十六〈列傳第四十一〉，頁1068。

¹⁷ 同註2，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經籍四〉，頁665。

¹⁸ 同上註。

¹⁹ 同註2，卷七十六〈列傳第四十一〉，頁1068。

能全變，其中原則兵亂積年，文章道盡。²⁰

而同樣的意見，也出現在其所主編的《群書治要》序言中：

競採浮豔之詞，爭馳迂誕之說，騁末學之傳聞，師雕蟲之小伎，流宕忘返，殊途同致。²¹

可見魏徵對這種文風抨擊的不餘遺力。然而國家興亡，原因多端，不可一味歸咎於文學，梁、陳是否因為淫麗之文而亡國有商榷餘地，但魏徵這樣的主張，是切合其政治家與史學家的學術眼光及立場的；同時提出這樣的看法，是帶有對唐太宗的警示作用。

前言提到，李唐開國在政治上很有一番新氣象新作為，但在文藝潮流方面，卻依然延襲著南朝以來輕豔麗靡，流連哀思的氣息，梁、陳宮體，盛行不衰。即便賢明如唐太宗，也常作宮體詩。《新唐書》便記載：

帝嘗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²²

從這段敘述可見在唐初文學中，南朝宮體詩歌所遺流的影響力。但魏徵與虞世南一樣，認為宮體詩不雅正，甚至是以雕琢藻飾的形式，寄寓了閨閣放蕩的內容，反映統治者腐朽病態的生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此認為這類詩歌不可鼓勵創作。魏徵認為：「古者陳詩觀風，斯亦所以關乎

盛衰者也。」²³對梁、陳淫麗文風的嚴厲批評，意在提醒君王，必須以古為鑑，不可重蹈覆轍，

肆、對南北文風的看法

影響文學風格的因素很多，除了作者個人的才學性情、生平閱歷之外，諸如地理環境、文化風尚、社會習俗、政治制度、文學傳統等等，都是型塑文學風格的原因；而在南北朝時代，文學風格的差異更是明顯，魏徵即曾指出其差異所在：

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²⁴

魏徵在這段話中將南北朝詩人的創作風格，作了概括性的論述。所謂「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即讚揚南方文學的聲韻旋律的協調性，以及辭藻華麗，對偶工整，適合放入歌曲中的特色。從中，也可以看出魏徵對文采偏愛欣賞的態度。前面提到魏徵在《隋書·文學傳序》引述的話：「《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說明沒有文采的言論難以流傳久遠，以及「綉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靈運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輝煥斌蔚」這些話，在在肯定了華麗文采。魏徵還曾經讚美《楚辭》「氣質高麗，雅致清遠，後之文人，咸不能逮」²⁵，凡此種種，都顯現了魏徵對文學形式美的重視。但這種形式美，與其抨擊的梁、陳「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的那種只注重追求形式技巧，然而內容格調低俗的宮體駢儷之類的作品的形式美是不一樣的。

²⁰ 同註2，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經籍四〉，頁665。

²¹ 同註5，《群書治要》序。

²² 《新唐書》卷一百二〈列傳第二十七·岑廙李褚姚令狐〉（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74冊），頁307。

²³ 同註2，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經籍四〉，頁665。

²⁴ 同註2，卷七十六〈列傳第四十一〉，頁1068。

²⁵ 同註2，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經籍四〉，頁649。

再看「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北方文學的內容樸實，較具實用性，表達出意志堅強、剛正爽直的性格，其樸實無華的本質，顯得比較粗獷。然而，魏徵所謂南北詞人得失比較的言論，若從文學史的立場來看，如劉大杰所說，許多北方詩人的作品，無論內容形式，都受到南方詩歌的感染。²⁶亦即，北朝文學大致是模擬南朝文學，而所謂「貞剛」、「理深者便於時用」云云，對於北朝文學的評價有所偏高，《南北朝文學史》也認為隋及唐初的著名學者、文人中有不少人生長在北方，然而仔細推究，其學說和文風多半受過南方的影響。²⁷錢鍾書於《管錐編》中便說：

蓋南北朝文同風合流，北士自覺與南人相形見絀，不恥降心取下，循轍追跡。……

《隋書》曰：「質勝」，以短為長，猶因背偃而稱謙態鞠躬、頰腫而讚貴相頤豐也。²⁸

故此，若將魏徵對南北文風差異的看法，理解為南北地域不同，因此呈現的風格不同，這是比較允當的。

另外，魏徵從南北文風的差異出發，主張各去所短，合其兩長，要融合北方質樸豪邁，與南方綺麗華美的風格，同時注重情志內容與形式美，提出文質並重的折衷論調。這種看法在後來唐代詩歌的發展中得到了印證。唐代詩歌是南北地域文化合流的產物，既吸收了南朝文學在聲律等形式美方面的探索，亦吸收了北方文學剛健、豪邁、質樸等風格特質。魏徵主張融合南北文風，對唐代詩歌創作和理論發展有一定的開啟之功，這種主張符合了在一個大一統帝國的環境之下，

文學發展自然而然的融合過程。

伍、結語

綜上所述，魏徵以其政治家、史學家的眼光，注重文學政治教化的作用，但亦不廢棄文學緣情述懷的功能。反對六朝綺豔的文風，但接受了六朝在文學藝術形式上的探索與發展，從而主張文質並重，同時注重內容與形式。這些，都反映了魏徵對文學所抱持的平衡穩健心態。而其主張融合南北文風，對唐代詩歌創作和理論發展有一定的開啟之功；特別是對梁陳宮體駢儷之類作品的抨擊，對初唐文學的走向與發展也有一定的引導作用。

徵引書目

1. 魏·王弼《周易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2. 晉·杜氏注、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3. 唐·魏徵等撰《隋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4. 唐·魏徵等撰《群書治要》，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 年。
5.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6. 宋·歐陽脩撰《新唐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7. 明·陸時雍編《唐詩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8.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1988 年 4 月。
9. 錢鍾書《管錐編》，台北：書林，1990 年 8 月 8 日。
10.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1991 年 7 月。
11. 曹道衡、沈玉成編著《南北朝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 6 月。

²⁶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第十一章〈南北朝的詩歌〉，頁 358。

²⁷ 曹道衡、沈玉成編著《南北朝文學史》第二十七章〈南北文風的融合〉，頁 492-493。

²⁸ 錢鍾書《管錐編》二五三〈全北齊文卷三，南北朝文風——嚴輯拾遺〉，頁 1508。

13. 黃壽祺、張善文 譯注《周易譯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4 月。